

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

张 越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的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很快确立起来。在“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里,中国大陆史学界最引人关注也是最有影响的史学现象,就是对“五朵金花”及相关问题所进行的大范围地、深入地、热烈地讨论。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或已不再那样地引人注目,或被认为是“假问题”而受到某种质疑,或被看成是泛意识形态化而被轻视甚至不屑。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具有如此规模的学术现象、一个集结宏观理论支持和具体研究充实的问题群体,因种种原因在一个时期里过热或过冷都不一定是正常的,包含其学术内涵之外的其他因素往往产生过多的影响,而其自身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仍然不可轻视。

“五朵金花”的讨论,在1978年以后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渐趋形成,“五朵金花”中的“花朵”,有的以新的方式继续被讨论和研究,有的被冷落、怀疑或批评。“五朵金花”束在一起竞相开放的盛况不在。然而,以“五朵金花”为标志的对各种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研究中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全面深入地探讨,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则是不争的事实,其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必将深远而长久的。进入21世纪后,不仅对相关“花朵”作进一步研究的进展明显,而且以“五朵金花”为专题研究的成果也渐次出现。^①

“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是翦伯赞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向达时提到而为人知的,翦伯赞说“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只看到这‘五朵花’,而且最讨厌这五朵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转引自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第2页注1,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959年随着电影《五朵金花》的热映,史学界这“五朵花”被称为“五朵金花”流传开来。“五朵金花”被正面看作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同上)而成为“十七年”史学最重要的研究成就。不论是向达的挪揄还是翦伯赞的批判,也不论从“五朵花”到“五朵金花”称谓的语气转变,重要的是,“五朵金花”“点出了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这一其他时期少见的现象”(罗志田:《文革前

[收稿日期] 2011-06-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770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① 如: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五朵金花”的学术意义正体现在这里。

“五朵金花”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他们被“播种”、“生根”、“开花”的时间和方式不一,但是集结为“五朵金花”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开始于1950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两天后发表郭沫若的《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认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立即在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反右”和“史学革命”期间沉寂一段时间,1959年至60年代初再度活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提出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问题,此后引发史学界的热烈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1949年至1957年以提出问题、初步研究和史料整理为主,1958年至1966年对农民战争若干理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引起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范文澜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针对斯大林相关民族问题理论和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提出汉民族形成在秦汉时期。(详见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92—21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里简要罗列“五朵金花”讨论的缘起情况,是想说明:第一,“五朵金花”讨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史学家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去、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第二,问题的提出,虽大多是由一篇文章、一个观点而引发,但是这些问题多为以往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成为新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关注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重大意义的问题;第三,就问题本身而言,都是在试图回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宏观问题,试图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道路。

在这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而不仅仅将朝代更迭视为历史阶段性发展的标志,是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后中国史学的主要变化之一,以某种历史观为基本理论贯穿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与撰述,最基本的反映就是历史阶段的划分,古史分期又并非简单地划分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历史观的反映,是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展现,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纠结于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学中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继续,以社会经济形态变动学说来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划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标准、奴隶社会是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是否经历独特的发展道路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不是必须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回答的,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看,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努力证明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发展到50年代以后经过深入讨论逐渐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尽管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痕迹仍然明显,政治干扰学术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有学者指出:“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项诉求,人们渴望知道过去的历史,更渴望知道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绕不开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绕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这又涉及到历史的功能及历史的最终关怀问题)。而要做到这些,又必须对历史时段进行划分,阐明每一历史时段的特质,以探索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分期问题论辩》,第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古史分期问题作为“五朵金花”之冠并非偶然。

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两个问题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延伸。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形式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构成与影响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地主所有制。不同的观点下其实反映着趋同的学术目的,如林甘泉认为:“我是赞同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但我认为有的学者提出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理论上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注意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林甘泉:《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通过讨论,“‘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的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154—1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从史实中开拓相关领域的课题意识,同样表现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即封建社会之后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该问题之所以引发讨论,就在于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看到了后期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变化,这同样是着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在发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该问题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在当今学术界获得最多赞誉的金花之一。林甘泉说“如果没有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就没有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也就没有今天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繁荣局面。”(林甘泉《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赵世瑜等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仍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痕迹,但是由于讨论需要大量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所以它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50年代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在80年代以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等相互关联,究其原因,该问题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是不争的事实。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孕育产生于古史分期问题,却开花结果于各自的领域,成为“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奇葩。

对农民战争问题展开讨论带有更强的时代色彩。从1949年到1957年,先后发表了650余篇相关文章,出版了70余种相关出版物,1958年至1966年,发表相关文章达2300篇(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38页),成果数量可谓惊人。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如此高涨,与新中国建立后政权性质的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相关论断,史学界阶级分析方法的倍受重视等都有直接关系。就问题本身而言,全面颠覆以往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无比广阔的研究空间。从对史料的整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同上,第38页)”等一系列具体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农民战争问题成为“五朵金花”中绽放的最为夺目的金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至今日,农民战争问题却成为“五朵金花”中最受冷落的一支。应当看到,“十七年”时期,由于过分强调农民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阶级斗争观点,特别是无限抬高农民战争作用,致使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偏差。但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产生有包括改朝换代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农民战争的全面研究与重视,无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上,还是在农民战争本身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某国外史学评论家认为,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以及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0页)通过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历史发展动因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开辟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样一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

在“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中,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与其他问题相比,在规模和成果数量上可能显得较弱一些。然而,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却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比较而言,古史分期的讨论对中国历史研究诸多重大问题的涵盖性和研究视角的宏观性最为突出,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上升为最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范文澜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看上去是依据斯大林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这样的民族定义得出了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的观点,但是斯大林观点还包括民族是在资产阶级发展中形成的,如此推论,则汉族只能是“部族”而非“民族”,故而苏联学者提出了“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结论。范文澜的见解,实际上是与斯大林民族产生于近代的理论相抵触的,说的明确一点,是对50年代在中国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相关观点的挑战。这里不想再重复范文澜等史家是如何努力把中国历史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老话,只是想指出,诸如汉民族形成等问题因其事关国家民族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学者必须要从学理上予以澄清的,也是中国史家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范文澜针对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五朵金花”之一(而不是在当时讨论的热烈程度并不亚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正表明范文澜等中国史家在如此重大和关键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到了60年代,民族认定工作的基本完成、斯大林神圣光环的逐渐褪色,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讨论的范围也扩展至对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政策的评价、怎样看待民族间的“和亲”^①等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全面研究。笔者愿意引用当年“五朵金花”讨论中的主要参与者赵俪生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我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把‘五朵金花’看作是‘五朵病梅’的,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王学典、蒋海升:《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易宁)

^① 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2页;宋德金《汉民族形成问题》,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5页。